

DOI: 10.14015/j.cnki.1004-8049.2015.05.004

李大陆 “论‘不对称’军事制衡”,《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5期,第26-36页。

LI Dalu, "On 'Asymmetrical' Balance of Military Power" *Pacific Journal*, Vol. 23, No. 5, 2015, pp. 26-36.

论“不对称”军事制衡

李大陆¹

(1.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100872)

摘要:“不对称”制衡是针对他国的弱点来发展与对手不同的技术或战略,从而抗衡他国权力的扩张或缩小双方的实力差距。技术能力和军事战略文化是决定一国能否采取“不对称”军事制衡的重要原因。冷战后,中美两国形成了动态“不对称”的海洋军事制衡。中国旨在通过发展导弹、潜艇、陆基航空兵以应对美国海上力量过于依赖航母等大型战略投送平台、前沿基地和C⁴ISR系统等弱点,而美国则试图在太空和空中作战两方面形成“不对称”的技术优势。动态“不对称”海洋军事制衡是中美两国军事战略互动的一个基本方面,对东亚和平与安全有着重大影响。

关键词: 制衡 “不对称”战略; 中国海权; 美国海权

中图分类号: D81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049(2015)05-0026-11

国际关系的历史表明,国家运用“不对称”战略通常能成功达到制衡的目的。回顾历史,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英国的海军、荷兰、瑞典等国的陆军都曾以“不对称”战略成功地遏止了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在海洋和大陆上的扩张;从1945年至今,若干国家也通过发展核武器抗衡常规军力强大的超级大国;在冷战后,美国通过运用信息技术来扩大相对于各个“中等强国”的军事优势。审视现实,在中国海权快速扩展的当下,“不对称”制衡也在事实上构成了中国海洋军事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防范区域外强国干涉我国国家统一以及近海海域、岛礁争端的重要手段。因“不对称”制衡在国家军事竞

争中的重要性,本文拟探究“不对称”制衡的含义,研究其形成机理,以及从“对称”/“不对称”的角度构建国家间军事制衡的分析框架。特别是通过运用“对称”/“不对称”制衡的分析框架,可以透视中美海洋军事关系的重要特征和内在规律,加深对东亚和平与安全具有重大意义的中美军事关系的认识。

一、“不对称”制衡的概念辨析

基于对“不对称”战略和“制衡”两个概念的理解,本文认为,“不对称”制衡就是针对他国的弱点来发展与对手不同的技术或战略,从而

收稿日期: 2015-01-22; 修订日期: 2015-04-05。

作者简介: 李大陆(1984—),男,山东烟台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博士研究生,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发展战略研究中心项目主管,主要研究方向: 地缘政治和国际安全。

抗衡他国权力的扩张或缩小双方的实力差距。

第一,作为理解国际格局和国家行为的一个关键概念,“制衡”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被频繁地讨论。虽然几乎每个国际政治学者都会使用这个概念,但依然缺少对这一概念的准确界定。一些学者极力将这一概念泛化。苏珊·马丁(Susan Martin)就认为,“制衡”是国家抗衡外部威胁的一种行动。^①科林·埃尔曼(Colin Elman)也认为,“制衡”是国家为了实施威慑以及打败另一个国家而设计的抗衡政策,其目的是增强军事能力。^②另一些学者对“制衡”的理解又太过狭窄,将其理解为国家通过内部动员或结盟的方式加强军力,从而预防或挫败外国或敌对联盟的政治、军事控制。^③但学界研究“制衡”行为却有一种共同点,即通常是借助对国家谋霸和反霸行为的理解来赋予其基本含义。因而,制衡通常与“均势”或“权力转移”相联系。^④例如,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就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认为,“建立均势”是大国用来阻止敌人颠覆均势的主要战略,“通过建立均势,受威胁的国家本身必须参与遏制(制衡)危险的对手。换句话说,它们愿意担负遏制和抗击入侵者的重任”。^⑤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对“制衡”的理解就来自对国际关系均势历史的考察,尤其是以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大国战略来分析“制衡”的普遍性。^⑥在现代国际政治研究中,很多学者分析“制衡”也都以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关于均势的讨论为背景,甚至是围绕沃尔兹的讨论展开的。

由此,本文依据有关均势和权势转移理论,将“制衡”定义为一国通过扩展实力来消除与他国的实力差距或抗衡他国实力扩展的行为。一国通过扩大实力来对冲他国增进实力是一种典型的“制衡”行为。它反映了均势理论对国家行为的最主要预期,历史上欧洲均势体系的生成机理也正在于此。英国与腓力二世时期的西班牙和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的全面对抗,都在西、法两国权势如日中天时来临。英国正是在西、法两国侵吞欧洲的高峰时扩军、结盟、作战,以图恢复

权力均衡。英国的这种行为,也被历来的国际关系学者视为“制衡”的最佳诠释。但是,在霸权国行将衰落时加入反霸联盟,襄助反霸领导者打击谋霸者,进一步缩小谋霸者与反霸者的实力差距,也是一种“制衡”行为。此种“制衡”行为的典型例子是拿破仑征俄失败后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反法行动。普奥两国在拿破仑称霸欧洲时采取“追随”战略,但在俄国给予法国霸权致命一击时加入反法阵营,其目的在于推翻拿破仑帝国。它们同英俄两国在霸权国实力扩张时采取的反制行为虽有不同,但同样构成一种“制衡”行为。

因此,本文认为“制衡”包括两种行为:通过实力扩展消除与他国的实力差距;以实力抗衡他国实力的扩展。在此特别要强调的是,制衡指涉国家的行为而非结果,它是指国家的一项政策或战略。制衡的结果既可以是成功的,也可以是失败的。制衡成功就是恢复均衡或获得优势,制衡失败则是丧失均衡或丧失优势。此外,制衡也与意图无关。无论意图是维护安全,还是扩大利益或谋霸,只要是以实力的扩展来消除与他国的实力差距或抗衡他国实力扩展,都可以被认为是制衡行为。如国内学者刘丰认为,“制衡是国家面对霸权威胁时的外在行为的表现,这种表现可能是国家有目的的选择,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反应。之所以不考虑国家的目的和动机界定制衡,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在结构压力下,国家的动机和行为可能会发生脱节;另一方面,制衡行为能够缩小与霸权国之间的相对实力差距,或者抵消霸权国的实力优势,本身就可以满足谋求自保、维持均势、争

① Susan B. Martin, "From Balance of Power to Balancing Behavior", in Andrew K. Hanami, ed., *Perspectives on Structural Realism*,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 70.

② 刘丰“大国制衡行为的概念辨析”,《国际论坛》2010年第1期,第47页。

③ Randall 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the Balance of Pow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9.

④ 同②,第47-49页。

⑤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页。

⑥ Paul Schroeder, "Historical Reality vs. Neo-Realist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pp. 120-124.

夺霸权等不同层次的需求”。^①

第二,作为实施制衡的一种方法,“不对称”作战/行动/战略说到底反映了一种战略哲学,即在存在强弱异势和手段差异的战略互动中,弱者通过扬长避短、以弱胜强,促成强弱转化的方法、行为或思维。“不对称”战略思想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中国的《孙子兵法》与古罗马的《谋略》、《兵法简述》就有若干富含“不对称”战略智慧的训诫。而近现代关于这一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论说,则可见于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对“间接路线”的强调,以及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之战略问题的阐释。冷战后,美军海外征战积累了大量经验,对“不对称”战略/作战的研究也走在世界前列,产生了若干研究成果。一般来说,美军以“不对称”行动强调威胁的特性及双方对抗的不同方式,并特别强调“不对称”行动的目的是打击敌军弱点。在美国国防部看来,“不对称”行动是企图使用与敌人通常的军事行动模式完全不同的方法,阻止或削弱敌人的长处,同时利用其弱点的战争行为。美军在1991年版的《美国武装部队联合作战》、1995年版、2001年版和2006年版的《联合作战纲要》中都认为,如果双方部队的武器和战术相似,则属于对称性作战;如果一方采取恐怖主义行动,或采取非常规的交战规则,则属于不对称作战。^②1999年,美国在《计划战略评论》中将“不对称”行动解释为“企图通过采用与美国预想的极其不同的作战方法,阻止或削弱美国的长处,同时利用美国的弱点。”^③在同年的《联合战略评估》中也提出,不对称方法是使用美国预料之外的方法来利用美国的弱点。^④2000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2020联合构想》中认为:“非对称进攻造成的心理压力可能远超过实际的物质损失。对手将通过寻找美国的关键性弱点,发展非对称战争理论和实力来进攻或扩大这些弱点,进而在战术、战役或战略各个层次上获取非对称优势。”^⑤英国、俄罗斯、以色列等国也提出了与此相似的“不对称”作战思想。俄罗斯将“不对称”作战视为一种“对称的缺失或破坏”的状态。英国官方则将“不对称”作战解释

为:由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通过利用不一样的战略、组织和能力,旨在打击敌人的弱点,挫败或抵消对手长处的行动。以色列也从频繁的对外战争中认识到“不对称”作战的复杂性,并认为“不对称”作战的特性包括敌我双方的实力与作战方式差距,以及以弱胜强的非常规结果。^⑥

关于“不对称”冲突或战略的研究,中国也有若干成果问世。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安全战略研究中心在《非对称作战理论研究》一书中,通过研究古今中外主要国家军队的非对称作战理论,阐明了不对称作战的基本内涵及其形成机理,以及其发展规律和现实意义。^⑦乔良和王湘穗在《超限战》中也视“非均衡原则”为重要的战争制胜之道。他们提出,“只要正确地掌握和运用非均衡原则,就总能找到并抓住敌方的软肋”^⑧。杨少华在其专著《当代不对称冲突研究——一项以战略为视角的考察》中,提出不对称战略的根本特征是剥夺对方的战争意志,而非摧毁对手的有生力量。^⑨

基于上述的分析,本文认为“不对称”战略应该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首先,“不对称”战略强调避实击虚,即打击对手的弱点。它是指“间接路线”而非“直接路线”,集聚资源在对手占优的地方获胜绝非“不对称”战略。例如,“一战”中“堑壕战”的特点是兵力对兵力、火力对火力的直接碰撞,这就完全走向了“不对称”战略的反面。相反,“二战”中的“闪电战”旨在快速突破防御前

① 刘丰“大国制衡行为的概念辨析”,《国际论坛》2010年第1期,第48页。

②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安全战略研究中心编《非对称作战理论研究》,中国宇航出版社2008年版,第135、137页。

③ 同②,第246页。

④ David I. Buffaloe, “Defining Asymmetric Warfare”, The Land Warfare Papers No. 58, September 2006, p. 4.

⑤ U. S. Joint Chiefs of Staff, “Joint Vision 2020”, p. 5, http://www.fs.fed.us/fire/doctrine/genesis_and_evolution/source_materials/joint_vision_2020.pdf.

⑥ 同②,第208-210页。

⑦ 同②。

⑧ 乔良、王湘穗著《超限战》,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

⑨ 杨少华著《当代不对称冲突研究——一项以战略为视角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9页。

沿 将己方的攻击指向对方的指挥和后勤体系,从而导致敌人物质和精神的全面瘫痪,这就反映出“不对称”战略的基本特征。

其次,“不对称”战略在手段上必须体现出差异性。手段上的差异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技术差异。国家可以立足装备的时代差异和军兵种差异形成“不对称”战略。①不同的武器装备在杀伤力、射程、防护力、机动性和信息化程度等关键性能上越具有代际差距,以其为手段形成的战略就越有不对称性。按照战争史的分期,冷兵器时代、黑火药时代、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核时代、信息时代顺次演进,在这些不同历史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武器之间的差异就体现出时代差异。具备或接近具备时代差异,意味着具有对手难以攀比的技术优势,这样构成了“不对称”战略的坚实基础。反之,武器的差异越不具有代际差距,越难以形成“不对称”战略,即便是形成“不对称”战略,战略优势也是相对短暂的。②运用不同军兵种进行对抗也可以形成“不对称”战略。在国际关系史上,这是一种更为常见的“不对称”战略。例如,骑兵对抗步兵、空军对抗陆军、潜艇对抗水面舰队都是常见的“不对称”战略形式。二是作战方法的差异。即因为采用了不同的训练、组织或理论学说,在人员和武器使用上具有不同于对手的模式,从而形成了“不对称”战略。例如,从17世纪的西班牙方阵到“三十年战争”中的线性队列,从“二战”中德国的“闪电战”到美国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空地一体战”,就是立足作战方法变革的“不对称”战略。三是数量上的差异。这是指一方可以凭借在装备或人员上的数量优势形成“不对称”战略。例如在海湾战争中,伊拉克虽然装备了与美国空军相似的第三代战机,但是数量太少。凭借第三代战机上的数量优势,美国仍然可以不对称地制衡伊拉克。

事实证明,“不对称”战略通常正是国家实施制衡的有效方式。其缘由在于:第一,“不对称”战略可以增大战争胜率。战争是制衡的基本方式。运用“不对称”战略来打击对方弱点,可以迅速造成对方军事机器的瘫痪;使用具有

差异性的手段,使旧的军事思维、方法难以适应新的环境,从而既在物理上破坏对手的军力运用,又在心理、认知上瓦解对手的指挥过程,为己方取胜获得决定性优势。第二,“不对称”战略可以提高威慑效力。提高胜率本身就意味着实施“不对称”战略的一方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慑止对手采取对己不利的行动。一旦制衡方形成不对称能力,就无异于向被制衡方传递了实施报复的可信信息,表达了捍卫自身利益的坚定决心。由手段差异凸显出的军力对比,也使被制衡方更容易认识到自身的不足,正视制衡方的能力和利益诉求,从而达到有效威慑的目的。第三,运用“不对称”战略实施制衡的成本较低。一般来说,“不对称”战略有突然性和快速性的特点,可以避免形成长期消耗的局面,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它不求在全局上压倒对手,而是通过形成局部优势获得全局性结果。它同样不求模仿式追赶,避免投入巨量资源克服对手在技术或战略上的先发优势,而是创造性地实现跨越式发展,另辟蹊径超越对手。“不对称”战略讲求知识和技术要素的投入,是“集约型”战略的典型代表。

二、形成“不对称”军事制衡的原因

一般来说,国家间实力的巨大差距以及国家间的权势转移,是导致一国采取“不对称”制衡的结构性动因。换言之,弱国或衰落中的国家更倾向于采取“不对称”军事战略。但本文认为,结构性因素特别是权力结构因素,在解释一国“不对称”战略时太过间接和抽象。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当弱国面对强国或他国的军事优势正在“缩水”时,就必然选择“不对称”战略。例如,近代中国与日本就没有选择与外国列强进行海权上的“不对称”竞争。它们无一例外地采用了与西方相同的技战术,建造与西方相似的蒸汽铁甲舰队。即便是当代单极结构的条件下,拥有巨大技术优势的美国也依旧立足技术优势运用“不对称”军事战略。这些事实告诉我们,权力分配格局虽然对国家的战略选择有根本

的限制作用,但是它依然为决策者留下了自由选择的空间。在笔者看来,是否采取“不对称”军事制衡,主要取决于国家的战略选择。具体地说,有两种因素决定了一国能否采取“不对称”军事制衡:技术能力与军事战略文化。第一,只有运用与对手不同的技术或战略才能形成“不对称”军事战略。一国必须具备相关的能力发展、获取或运用相关技术,才能形成区别于对手的军事技术装备,或相对于他国的巨大技术优势。产生这种装备或优势的能力可称为技术能力。第二,军事战略文化也对一国形成“不对称”军事战略有重大影响。它规定了国家如何看待冲突、如何争取胜利的思想框架,决定了一国是否可以接受“不对称”战略的制胜逻辑,以及通过何种方式形成“不对称”军事战略。

2.1 技术能力与“不对称”战略

技术环境、技术获取途径、技术自主研发能力是技术能力的核心变量。具体地说,首先,技术环境是指一个时代军事技术积累的状况、军事技术的范式,以及由军事技术创新展示的技术演变趋势。本文则用技术环境来描述一种情势,即在总的科技进步中存在某些成熟的技术可被国家用来发展“不对称”军事战略。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武器打什么样的仗,能否得到适当的武器是一国形成“不对称”战略的关键。军事技术成熟的标志主要是军事胜利,即一国通过战争胜利显示了一种技术手段的价值。技术的成熟程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匆忙运用新技术可能反受其害。就如“S形学习曲线”所揭示的,“技术进步在经历一个快速阶段后,会出现比较平稳的一段巩固期。在一项技术的早期阶段进行大量投资可能会产生很快就过时的装备。最好是等待尘埃落定后再进行大规模采购。落后于前沿一点点是最好的”^①。自近代以来,“不对称”军事战略通常内嵌于技术进步轨道上,正是技术环境为形成不对称优势提供了各种可能性。例如,正是在大帆船、炮架、火炮技术的进步中,英国建造了风帆战列舰舰队,并最终在格拉沃利讷海战中摧毁了西班牙无敌舰队。

其次,国家必须有相应的途径来获取军事技术,从而形成“不对称”军事战略。国家获取军事技术的路径有间接和直接两种:第一,贸易、文化、人员交流能拓宽国家获取先进军事技术的渠道,是国家获取先进军事技术的间接路径。借助人员、商品的密集流动,军事文献会大范围传播。围绕军民两用技术开展贸易活动,也间接帮助国家发展不对称战略。火药和冶铁技术15世纪在欧洲的传播就是如此,它使法国和西班牙军队装备了加农炮和滑膛枪,在意大利战争(1494—1559年)中把骑士与城堡扫出战争舞台,奠定了两国称霸欧洲的基础。第二,军事援助与军事贸易也是国家增强军力的主要方法,成为国家获取先进军事技术的直接路径。军事援助意味着一国直接对他国提供军事装备、技术方面的帮助。例如,在17世纪初期,荷兰军队接纳他国军人服役,并向友好国家提供军事专家,加速了欧洲新教国家对“线性作战”体系的学习,帮助新教国家形成相对于天主教国家的不对称优势。军事贸易则是千百年来政治集团学习战争、加强军事力量的基本方法。随着军事工具、战略方法日趋复杂,军事贸易的重要趋势是开展技术合作,即国家间共同开发和生产武器装备,在军事发展中共担成本,共获收益。21世纪中俄军事贸易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技术合作。在有关苏-27和苏-35的军贸中,中国就希望获得先进矢量发动机、有源相控阵雷达等方面的技术,以此推动陆基航空力量的发展,从而形成针对美国的“不对称”军事制衡。

再次,本国国防产业具备自主研发和生产能力同样构成一国形成“不对称”军事战略的必要条件。自主研发和生产能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第一,拥有自主研发和生产能力,可以提高一国通过军事交流汲取成熟军事技术的效率。^②这意味着一国可以将自身需要同技术学习结合

① [英]杰弗里·蒂尔著,师小芹译《21世纪海权指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6页。

② Cohen Wesley and Daniel Levinthal, “Absorptive Capacity: 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 35, No. 1, 1990, pp. 128-152.

起来,从而有针对性地、高效地吸收和消化外界的军事技术知识,进而通过学习、仿制形成创新能力,为形成不对称优势创造条件。第二,拥有自主研发和生产能力,可以避免军事学习蜕变为技术依赖。技术依赖或者表现为完全没有自主研发、生产武器装备的能力,或者表现为只能简单仿制外国的军事装备,意味着国家军事发展的自主性被剥夺,由此形成的“不对称”战略必然是不可持续的。第三,对于拥有强大的自主研发和生产能力的国家来说,可以“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即通过研发活动塑造技术环境,成为军事革命的引领者,从而依凭技术上的代际优势形成不对称优势。例如,冷战后,在第四代空军和全球快速打击系统的建设上,美国正引领着军事革命的方向,其提出和实践的新技术理念正成为其不对称技术优势的主要组成部分。

2.2 军事战略文化与“不对称”战略

同技术能力一样,军事战略文化对“不对称”战略也有直接影响。所谓军事战略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有关认知威胁、发展和运用武力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偏好。它主要表现为可以识别和理解威胁的道德理念,以及用以诠释制胜之道的原则与方法。^①

正如战略文化对战略决策的影响一样,在形成“不对称”军事战略的过程中,军事战略文化是一个无法单独起作用的因素:它不是影响军事战略的唯一要素,其对“不对称”军事战略的影响也不是直接、机械和简单的。国家军事战略的形成必然是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正如科林·格雷(Colin Gray)指出的,(军事)战略文化是战略决策的语境,而非一种解释性因果关系,是形成一国在武力使用方面的思想与行为模式。^②

具体地说,军事战略文化可以通过提供“因果关系范式”,推动一国进行“不对称”军事制衡。国家军事战略或军事制衡的目的是相对确定的,即赢得军事对抗或形成军事优势。但是在复杂的安全环境中,以何种方式实现这种目的则面临着不确定性。军事战略文化是一种普遍共识,它通过提供一种知识结构和偏好序列,

说明什么是实现目的的最优手段,为目的与手段间的协调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因果关系范式”。由此,军事战略文化通过规定因果范式,起着在不确定条件下指导行为的作用。以冷战时期美国的军事战略为例,“技术制胜”文化对其形成以技术优势为基础的“不对称”战略有重要影响。“技术制胜”文化是指以技术发展来解决军事战略问题的倾向,即最大限度地形成技术优势(而非战略、战术或人力资源优势)来应对威胁,并优先通过技术革新来解决战略和政治难题。科林·格雷就认为,当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介入世界权力政治的时候,就倾向于相信其技术能力将压倒任何敌人。在20世纪,只要有可能,美国倾向从事一场技术战争,而非以人力消耗战胜敌人。^③拉塞尔·F.韦格利(Russell F. Weigley)在《美国的战争方式》中也认为,美国民族性中的实用主义培育和助长了以技术躲避战略和政策难题的倾向。^④冷战中就有三个例子表现了“技术制胜”文化对美国军事战略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美国依凭核武器构建“大规模报复”战略;在越南战争中,美国希望通过组建河舟战斗单位、将战略轰炸机作战术运用、部署非接触性的地面传感器、使用无人机和激光制导弹药、构筑麦克纳马拉防线来应对这场战争;在80年代,则希望通过研发M1主战坦克、F-15战机、宙斯盾系统、实施网络中心战再度重建军事技术优势,以抵消苏联军力的数量优势。^⑤可以说,正是“技术制胜”文化推动美国在冷战中有着更快和更主动的技术强军步

① 国际政治学中的战略文化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军事战略文化研究。例如英国学者肯·布思(Ken Booth)认为,战略文化是指国家关于安全威胁或使用武力的传统、价值观、倾向、行为模式、惯例、表征和成就,连同适应环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Ken Booth, "The Concept of Strategic Culture Affirmed", in Carl Jacobsen, ed., *Strategic Power: USA/USSR*, Macmillan, 1990, p. 121.

② Colin Gray, *Modern Strate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8.

③ Colin Gray, "National Style in Strategy: An American Examp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6, No. 2, Fall 1981, pp. 26-30.

④ Russell F. Weigley, *The American Way of War: A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Military Strategy and Policy*, Collier Macmillan Publishers, 1973, p. 416.

⑤ Ibid④, pp. 107-118, 123-124.

伐,并直接导致冷战时代的军事技术发展维系在史无前例的高水平,由此直接表现了军事战略文化对“不对称”制衡的影响。

三、从“对称”/“不对称”来理解 军事制衡

上文我们从战略的角度来理解“不对称”军事制衡。接下来,本文拟在引入“对称”军事制衡这一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分析国家间军事制衡的框架。所谓“对称”军事制衡,指通过发展与对手相似的军事力量或军事战略,在对手具有优势的领域与其展开竞争,从而抗衡对手以军事力量扩大利益或缩小双方实力差距的行为。由此,可将国家间军事制衡分为:第一,依据对抗双方是单次互动还是多次互动,将冲突分为静态制衡和动态制衡。所谓静态制衡,指无论A国对B国采取的是“对称”制衡还是“不对称”制衡,B国的战略选择都不再发生变化。动态制衡是指B国随着A国的制衡行为相应地改变了制衡战略。第二,在区分静态制衡与动态制衡的前提下,可以将这两种制衡行为进行细分。前者包括静态“不对称”制衡和静态“对称”制衡,而后者包括动态“对称”制衡和动态“不对称”制衡。

第一,静态“不对称”军事制衡是指A国运用“不对称”军事战略对B国实施制衡,但是面对A国的制衡行为,B国沿用之前的战略选择。这一互动的结果通常是A国军事权势的形成,以至于B国最终无法制衡A国。马其顿军事霸权的崛起是静态“不对称”制衡的经典案例。腓力二世通过对希腊步兵方阵进行改革,马其顿在公元前4世纪形成了不对称优势。但是波斯和希腊无力适应这一变革,结果马其顿、希腊与波斯的军事平衡在海罗尼亚会战(公元前338年)、伊苏斯会战(公元前333年)、高加梅拉会战(公元前326年)后彻底颠覆,西方也走进了马其顿制权时代。

第二,静态“对称”军事制衡是指双方都以相同的军事力量或军事战略进行制衡,都试图

在对方有优势的方面压制对方。这种军事互动通常会导致政治僵局。如果军事制衡演变为战争,则可能形成长期的消耗战。从1500年到19世纪中叶的海权发展中,欧洲列强的海军制衡都是典型的静态“对称”制衡。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法国相继崛起,它们竞逐海权的方式都是建立一支以风帆战舰为主体的战列舰舰队。

第三,动态“对称”军事制衡是指A国以“不对称”战略来制衡B国,而面对A国的制衡行为,B国开始学习与A国相同的军事技术或战略,并试图在A国占优势的领域压倒A国,由此形成一种动态“对称”军事制衡。以最终的政治和军事结果而言,其与静态“对称”制衡并无差别。这种制衡的典型例证可见于17世纪的欧洲大陆。是时,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 Adolf)二世成功运用新出现的排枪和线性编队,形成了针对旧式方阵笨重和火力薄弱两项弱点的不对称优势。但是,“其他军队立刻仿效瑞典体系,第二年(1632年),在吕岑,由沃伦斯坦率领的哈布斯堡军队已经拥有了有效的火力,表现出占领阵地的灵活性”。^①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西欧的所有国家都采用细长的线性编队作战”,^②欧洲国家间的“不对称”制衡迅速转变为“对称”制衡。

最后,所谓动态“不对称”军事制衡,是指A国以“不对称”战略来制衡B国,但是B国随之也以“不对称”战略予以回应。这样的例子可见于冷战时期美苏两国海上力量的竞争中。为了制衡美国的海权,苏联利用美国海军补给线长及难以防御巡航导弹、弹道导弹的弱点大力发展潜艇力量,训练全面遂行破交、越岸打击、反登陆等多项任务。1956年,苏联海军司令部主导制定了“101号科研工作计划”,将破坏敌人的海洋交通运输及沿海地区的海军基地、工业中心作为首要任务。而美国反制苏联潜艇的方法也始终包含一项基于军兵种差异

① [美]杰弗里·帕克等著,傅景川等译《剑桥战争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页。

② 同①,第85页。

的“不对称”战略,即除了在苏联出北大西洋和北太平洋的主要航道布置大纵深的反潜区域之外,也利用航母编队发动“核一常”攻击破坏苏联潜艇基地,从而在源头上消除苏联的潜艇威胁。

四、中美两国海洋军事的动态 “不对称”制衡

冷战之后,在美国独大的世界海权单极格局下,中国海权快速崛起。在两国权力转移的过程中,美国对中国统一事业和东亚近海争端的潜在干预,以及其对东亚战略航道的控制,构成了两国的利益抵牾。中国希望通过扩展海上实力来缩小或消除与美国的实力差距,而美国则需要抗衡中国海上力量的扩展。在相互制衡的进程中,两国都在事实上推行“不对称”的海洋军事战略,由此形成了动态“不对称”海洋军事制衡关系。

海湾战争尤其是1997年和1998年台海危机之后,为防范美国对中国统一和东亚近海海域、岛礁争端的潜在干预,中国开始发展针对美国海上力量的“不对称”战略。这是一种立足军兵种差异的“不对称”战略,旨在通过发展导弹、潜艇、陆基航空兵来应对美国过于依赖航母等大型战略投送平台、前沿基地、跨洋补给线和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及监视系统(C⁴ISR)等特点。第一,作为中国弹道导弹的主力,东风-15/21短程/中程弹道导弹的打击范围可以覆盖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大部分海空军军事基地,^①可以以较高的效费比破坏美国海空军指挥控制节点、后勤补给体系枢纽、杀伤驻屯、集结中的海空军部队。东风-21D反舰弹道导弹则被认为是攻击美军关键作战平台的“撒手锏”。美国的海军专家就撰文声称,东风-21D以其造价、数量和射程优势将对美国航母编队造成巨大威胁。^②另外,中国在2007年1月11日成功进行了反卫星导弹试验,表明中国的动能反卫星能力取得巨大进步,初步具备威慑美国轨道设施的能力。而于2014

年1月成功进行的WU-14高超音速飞行器试验,预示我国弹道导弹的突防能力或有重大突破。陆基弹道导弹给美国海权带来的影响,正如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吉原峻(Toshi Yoshibara)和詹姆斯·霍姆斯(James R. Homles)所称,它们(陆基反舰弹道导弹)以其打击距离大陆遥远目标的能力,为中国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军事工具,使得中国可以控制远海空间的事务。这一剧变对美国迄今尚无争议的制海权造成影响的担忧激起了华盛顿的争论,实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海军崛起后所未见。^③第二,不断发展的中国潜艇兵力也被美国认为是威胁其东亚海上补给线的重要力量。毋庸置疑,潜艇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为陆权国发动“不对称”战争、打击海洋国家海运和水面舰队的利器。从2004—2006年,中国共计有18艘潜艇入役。从2011—2012年间8艘元级潜艇和1艘清级潜艇也加入到解放军的作战序列中。中国国产潜艇在1995—2005年间达到了29艘,平均每年2艘,自1995—2006年间,又装备了购自俄罗斯的12艘基洛级潜艇。^④而在元级潜艇上安装“不依赖空气推进装置”(AIP)系统则标志着中国潜艇质量的提升。美国海军情报办公室在2009年发布的报告中声称,中国装备的基洛-636型潜艇极难被侦测,元级潜艇的隐蔽性则比宋级优越但略逊于基洛级,同样被认为是一种较难

① Marshall Hoyer, "China's 'Antiaccess' Ballistic Missiles and U. S. Active Defense",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63, No. 4, Autumn 2010, pp. 96-97; Toshi Yoshibara, "Chinese Missile Strategy and the U. S. Naval Presence in Japan",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63, No. 3, Summer 2010, p. 43; [美]罗杰·克里夫著,肖铁峰译:“中国国防战略中的反进入措施——2011年1月27日在‘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上所作的证词”载郑晖、梁京平等主编《外国军事学术集萃》,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版,第79页。

② Henry J. Hendrix, *At What Cost a Carrier*,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March 2013, p. 8.

③ Toshi Yoshibara and James R. Homles *Red Star over the Pacific: China's Rise and the Challenge to U. S. Maritime Strategy*,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0, p. 104.

④ 上述数据都来源于 Ronald O'Rourke, "China Naval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U. S. Navy Capabilities——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December 23 2014, p. 14.

侦测到的潜艇。^① 美军的分析表明,中国潜艇虽然在设计水平上要落后于西方或俄罗斯,但其取得的成就依然代表了中国“不对称”战力的快速进步。第三,在陆基航空力量方面,可携带先进导弹的攻击机如歼-10/11、苏-30/35,以及正在研发J-20的作战半径都在1200千米以上,中国海军的歼轰-7的作战半径也可达900千米,因而具有摧毁第一岛链(距中国海岸线最近为200千米)之内或之外军事基础设施和作战平台的能力。中国携带长剑-10巡航导弹(射程在2000千米以上)的轰-6K战机(作战半径超过3000千米)更将关岛纳入打击范围。正如兰德公司在其2011年的报告《撼天裂地:21世纪中国空军运用概念》中谈及的,十年之前中国空军还是一支过时的空中力量,只装备以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设计为基础的武器装备,其人员训练大有问题,依赖过时的管理和作战理念。但是今天,它却向成为21世纪最现代、最有技能的空中力量迈进。但是,与导弹、潜艇、陆基航空力量等“不对称”手段的发展不同,中国海军在航空母舰和水面战舰方面相对滞后,只是迈出了建设蓝水海军的第一步,其对美国海上力量的威慑力也逊于前者。中国首艘航空母舰“辽宁”号在2012年才入役,类似于美国“阿利·伯克”级(20世纪80年代服役)的052D型导弹驱逐舰也只是在2014年入役。因而,“不对称”战略可以说是中国制衡美国海上军事力量的主要方式,在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构成中国近海防御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面对中国海上力量的“不对称”制衡,美国同样以“不对称”战略反制中国。从2005年发布《国家安全战略》和《中国军力报告》开始,美国就把中国的“不对称”性海洋军事力量视为一种“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② 在2006年美国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有18处提到“中国一反介入—区域拒止”,而到了2010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相关内容出现了34处之多。^③ 更重要的是,美国在其2010年版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正式提出“空海一体战”概念,以应对中国“不对称”军事力量的发展,^④并通过在2012年签

署《联合作战介入1.0版》将这一概念发展为“联合作战介入”战略。

“联合作战介入”也是一种“不对称”战略。美国在《联合作战介入1.0版》中提出,“联合作战介入”的一条关键规则就是在对手能力有限的领域率先开展行动,进而将优势扩展到其他领域。^⑤ 事实上,这正是一种对“不对称”战略的表述。伴随这一战略的调整,美国试图在太空和空中作战两方面形成“不对称”技术优势,专门针对中国太空战能力有限、防空能力不足的弱点。在现代战争中,太空是信息化作战和远程精确打击的制高点,太空战能力有限意味着解放军难以通过瘫痪对方的天基系统来获得信息优势,为己方部队生存和进攻创造条件,同时也意味着己方的天基系统可能被对方“致盲”,以至于难以在超视距作战中精确定位、跟踪,并形成联合作战优势。而防空能力不足则主要表现为没有有效的探测和反制五代战机的手段,以及反导能力不足。针对上述弱点,美国力图扩大太空战优势并夯实制空权。其主要举措是发展以太空监视网、天基监视系统和太空篱笆三项主系统为主要架构,以轨道深空成像系统(ODSI)、一体化空间态势感知系统(ISSA)和天基红外预警系统(SBIRS)为补充和优化的太空态势感知体系(SSA),奠定太空攻防优势的情报、侦察和监视(ISR)基础;^⑥通过发展各种天基、反导、激光、反卫星武器以及空天飞机等进攻武器来破坏对手的C⁴ISR系统,从而获取信

① U. S. Office of Navy Intelligence,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Navy: A Modern Navy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August 2009, p. 22, <http://www.fas.org/irp/agency/oni/pla-navy.pdf>.

② U. S.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5*, 2005, p. 33.

③ 上述数据都来源于 Ronald O'Rourke, "China Naval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U. S. Navy Capabilities—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December 23, 2014, p. 63.

④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2010", 2010, p. 31.

⑤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 Version 1.0", 17 January 2012, p. 21.

⑥ 所谓太空态势感知(SSA),是指对进入、离开、通过太空发生的各种情况的观察、认知活动的总和。

息域的控制权;^①通过发展 F6 系统(未来、快速、灵活、分解、自由飞行的航天器)和快速攻击识别探测系统(RAIDRS)来确保卫星的快速发射,保障太空系统在遭受破坏后快速修复;^②以及为防御反卫星导弹提供预警;^③从而加强美国的太空防御能力。

而为了利用中国防空能力上的“短板”美国继续夯实其空中作战优势。F-22 与 F-35 战斗机连同 B-2 轰炸机共同构成了美国空中远程打击的中坚力量。试验高超音速武器——X-37B, X-51A 和 SR-72 飞行器——展示了未来美国的“全球快速打击系统”。针对中国反导能力的不足,美国也加紧扩展其舰队实力。美国拟生产 3 艘 DDG-1000 “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以进一步提高对陆攻击的能力。而由 4 艘“俄亥俄”级巡航导弹核潜艇和(计划建造)30 艘“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构成的潜艇打击群,以及大约 88 艘由“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和提康德罗加巡洋舰构成的水面战舰打击群,构成了美国海军的两大战斧巡航导弹(最远射程约 2300 千米)打击集群,从而对中国防空系统造成更大压力。

两国在太空和空中作战领域的武器差距更接近于“代际”差距,是美国对中国海权进行“不对称”制衡的技术基础。在中美军事关系中,两军的技术差距是长期存在的,难以通过短期努力来完全弥补。2003 年,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资助下,由权威军事专家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等人领导的研究小组发布一份著名报告,声称中美军事有 20 年的差距。^④2012 年,时任解放军参谋长的陈炳德上将访美,也称中国落后美国军力 20 多年。^⑤俄罗斯国防工业界甚至提出了“发动机制约论”,认为中国在发动机制造工艺上的落后使中国的军备水平依旧处于相对不发达状态。^⑥俄罗斯《外国军事评论》刊文认为,虽然中国军事工业可以满足解放军的大部分需求,但是其生产的大部分武器的技战术性能在一些情况下低于主要国家的同类产品。“这是因为中国在科技领域,包括军事科研工作领域的落后状态仍然延续。一些工业企业有大量的老化和磨损设备,新材料生产能力有限。”^⑦在太空和空中

作战领域更是如此。与美国相比,中国的第五代空军尚没有形成作战能力,^⑧现役空战装备也不能有效抗衡美国的 F-22、F-35、B-2A 等战机。目前来看,中国可能只是初步尝试建立天基太空监视体系的技术,^⑨其太空监视系统以陆基雷达为主。它们受到天气、太阳黑点及地理位置上的限制,其感知能力必定远远不如美国已经于 2010 年建立的天基太空监视系统。后者利用太空高度弥补陆地设施的局限性,具备高容量和快速机动性,可以不分昼夜收集信息且不受天气影响,并能提高对目标的重复监视率。在太空跟踪与监视系统和天基红外预警系统方面,只有美国在高低轨道部署了红外弹道导弹探测卫星,中国正在探讨和设计相关轨道设施。^⑩中国虽然试射了 10 倍音速的超高速导弹,但其本身只是拥有

① 徐能武“21 世纪初美国外空攻防对抗准备论析——基于攻防理论视角”,《外交评论》2013 年第 3 期,第 83 页;吴勤:“美国空间对抗装备与技术新进展”,《现代军事》2009 年第 9 期,第 33-36 页;王友利、伍贻湘“美国空间对抗体系及典型装备发展研究”,载黎宏主编《2012: 国际军备控制与裁军》,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02 页。

②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Plan for Operationally Responsive Space: A Report to Congressional Defense Committees”, April 17 2007, pp. 2-5, <http://www.responsivespace.com/Conferences/RS5/4=17=07%20ORS%20Plan.pdf>; ORS, “Mission”, <http://ors.csd.disa.mil/mission/>.

③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U. S. Air force Makes the Raidrs System More Permanent”, <http://www.cast.cn/CastEn/Show.asp?ArticleID=44069>; Peterson Airforce Base, “16th Space Control Squadron”, <http://www.peterson.af.mil/library/factsheets/factsheet.asp?id=8403>.

④ [美]哈罗德·布朗、约瑟夫·W. 普理赫、亚当·西格尔著,张宏飞译“中美军事力量差距有多大”,《国际展望》2003 年第 7 期,第 18 页。

⑤ “解放军总长陈炳德坦言中美军力差距 20 年”,人民网, <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14686557.html>.

⑥ “俄恢复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内幕”,《汉和防务评论》,2013 年第 9 期,第 40 页。

⑦ 蓝山编译“中国军事工业概况及主要发展方向”,《亚太防务》2014 年第 1 期,第 8 页。

⑧ 至 2014 年底,中国被曝光的正在试飞的歼-20 战机约有 6~7 架,根据中国空军新型飞机从试飞到服务一般需要 5~6 年的规律,歼-20 迟至 2017 年才有可能小批量装备。

⑨ 2013 年 7 月,中国发射了实践-15 号卫星,用于开展观测空间碎片试验,这可能是中国建立空天监视系统的一个前奏。“我国‘一箭三星’成功发射 3 颗技术科学实验卫星”,人民网, <http://pic.people.com.cn/n/2013/0720/c1016-22262496.html>.

⑩ John Chang “中国建设弹道导弹预警卫星体系”,《汉和防务评论》2013 年第 9 期,第 40 页。

空天战机的第一步。美国依凭试验 X-37B、X-51A 取得的技术进步仍将是未来空权革命的引领者。

五、结 语

本文从分析“制衡”与“不对称”战略来认识国际关系中的“不对称”制衡,并为认识国家间的军事制衡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国家间制衡的进程及成败机理可以纳入这一框架中进行理解。通过运用这一框架,本文分析了当今世界极其重要的一对战略关系——中美海权关系,认为两国形成了一种动态“不对称”的海洋军事制衡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框架立

足于分析军事力量本身,通过剥离政治和贸易环境来看待国家间安全关系。这样做的合理性就在于在民族国家体系内,军事力量依然是权力的核心要素,或至少是与金融、外交并列的一项权力资源。发展和运用军事力量,也依然构成实现国家利益的基础。因而,探寻战略互动的军事逻辑,本身就提供了一种认识新时代安全问题、追踪国家战略演变的分析工具。这对我们把握一个长时段内大国战略互动的宏观结构、基本特征和演变脉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编辑 肖琳

On “Asymmetrical” Balance of Military Power

LI Dalu¹

(1. Renmin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Asymmetrical balance” focuses on developing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technology (or strategy) which mainly targets opponents’ weakness, so as to antagonize the enlargement of opponents’ power or to narrow the developing gap. Technology strength and the culture of military strategy are the key factors which determine whether a country can take asymmetrical balance. After the Cold War, the U. S. and China have come into a period of dynamic asymmetrical marine military balance. By developing land-based ballistic missiles, submarine and land-based aviation, China tries to counterbalance U. S. marine power, because U. S. depends too heavily on large strategic delivery platforms such as aircraft carriers, frontier bases and C⁴ISR systems. In the meantime, through space and aerial warfare, the U. S. is trying to build up asymmetrical advantages towards China. Dynamical “asymmetric balance” of sea powers not only constitutes a fundamental part of the strategic interaction between U. S. and China, but also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peace and security in East Asia.

Key words: balance; asymmetrical strategy; China’s sea power; U. S. sea power